

基于历史方位视角构建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话语体系^{*}

沈伯平

[关键词] 历史方位；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话语体系建构

[摘要]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艰辛历程对我国发展所处历史方位认识的视角，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形塑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主要矛盾的变化以及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这一新的历史方位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则决定了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创新性发展。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再到新发展阶段，这三者之间是一种相互包含、层层递进和跃升的关系，贯穿于其中的主线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为构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道路话语体系提供了一以贯之的参照系。

[作者简介] 沈伯平，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江苏 南京 210023）。

引言

走自己的路，是中国共产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而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它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①中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以来领导中国人民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创的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建设和改革道路，它包括实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

* 本文系教育部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项目（项目号：16JDSZK011）和江苏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道路与华盛顿共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比较分析框架”（项目号：17WTA017）的阶段性成果。

① 参见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4页。

革命道路，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以苏为鉴、独立自主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道路特指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历代政治领导集体领导人民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接力探索出来的、并于十八大之后臻于成熟的、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一道路的艰辛探索，始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形成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创新发展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①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②同时强调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着力点、着重点。“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所产生的重大理论成果，为我们建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话语体系提供了根本的理论遵循和行动指南。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美两国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对抗与冲突越来越常态化，尽管两国在硬实力方面的差距日益缩小，但我国在软实力，尤其是在意识形态话语权方面的影响力还无法与其迅速崛起的全球经济地位相匹配。硬实力领域“西风东渐”^④与软实力领域“西强东弱”并存的格局并未根本改变。因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梳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历程及其理论基础，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构建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整体分析框架，对于深刻解读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多年，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历史性变革中所蕴藏的内在逻辑，讲清楚历史性成就背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优势，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⑤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⑥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拟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进程中对我国发展所处历史方位认识的演变视角对其进行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框架下的系统理论概括与阐释，尤其是侧重阐释十八大之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创新性发展，尝试构建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道路话语体系，力争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中国共产党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⑦争夺中国道路的话语权。

① 参见《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7页。

② 参见《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331页。

③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页。

④ 硬实力领域的“西风东渐”，是指全球经济增长的中心越来越从西半球（以美国为中心）转向东半球（以中国为中心）。

⑤ 参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326页。

⑥ 参见习近平：《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人民日报》2021年6月1日。

⑦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46页。

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1978）：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艰辛探索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般规律，对于—国现代化建设具有极其重要指导意义。—国的社会发展理念尤其是一国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取决于其是否正确反映了社会存在状况。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顶层设计和总体部署必须从我国的社会存在出发，即从我国现实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出发，也就是要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发展要求出发。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现实国情所决定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决定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发展仍然是解决当代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因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正确认识党和人民事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是我们党明确阶段性中心任务、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也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经验。^①只有正确判断本国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才能准确认识我国生产力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准确把握该阶段经济社会生活的主要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方能据此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进而指导本国实践。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过程中的运用与发展。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指导下，积极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社会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1949年3月，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②的历史任务。新中国成立后，党又适时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九五六年，我国基本上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和进步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重要前提。对此，毛泽东指出：“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要向哪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发展，甚至连国外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了。”^③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我们也出现了一些失误和偏差，主要表现为：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选择和理解上过于单一，追求纯粹的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搞“一大二公，纯而又纯”；在公有制实现形式的选择和理解上过于简单化，只注意到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这两种基本形式，而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公有制经济可以和非公经济共同发展缺乏应有的认识。但是，不能因为出现这些失误和偏差而否定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意义。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们党就明确提出要以苏为鉴，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的“第二次结合”，独立自主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④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包括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尊重价值规律等，这

① 参见习近平：《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47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7页。

③④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14、23页。

些独创性理论成果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①在这一历史时期,我国还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生产条件显著改变,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但由于当时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还没有形成科学的理论,对“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理论还没有完全搞清楚,致使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使得我们在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失误和挫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所指出的:“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先例,犹如攀登一座人迹未至的高山,一切攀登者都要披荆斩棘、开通道路。”^②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指出:“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党领导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③

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8—2012):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形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提出,现在搞建设,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对此,他指出:“现在我们正在总结建国三十年的经验。总起来说,第一,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过去就是吃‘左’的亏。第二,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要讲究经济效益。只有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随之逐步增加人民的收入。”^④十三大前夕,邓小平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⑤党的十三大报告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含义并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路线。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讲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搞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⑥党的十八大报告则进一步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基于对中国国情的准确把握,揭示了当代中国的历史方位,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重大发展和重大突破。^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为我们理解和阐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魅力及其发展规律提供了理论和现实依据(见图1)。

①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3页。

②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1页。

③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4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12—313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2页。

⑥ 《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页。

⑦ 参见本书编写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年,第11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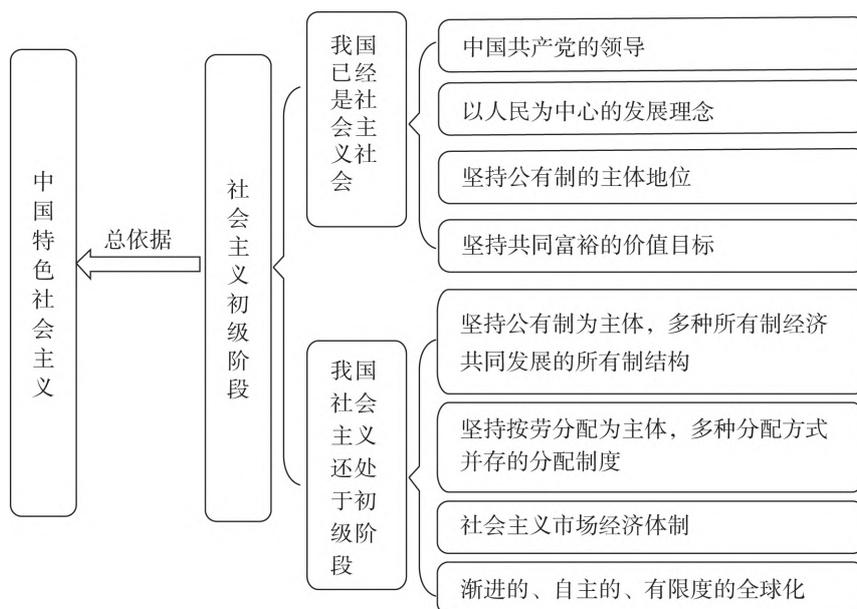


图1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实国情与中国道路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含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①前者指明中国社会的性质，后者表明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主词是社会主义，我们必须坚守中国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属性，必须坚持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方向，亦即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的普遍性或者制度性属性；其次才是中国特色，中国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没有经历西方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这就决定了我国在社会主义政权建立起来之后，必须经历一个相当长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去实现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就已经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这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的历史前提以及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现实状况决定了中国必须走一条与西方完全不同的现代化道路。我们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学会利用资本主义，跨越卡夫丁峡谷。任何事物都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两者缺一不可。

首先，作为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一般经济特征，必须符合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②具体包括：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必须坚持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这四个方面正是中国道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属性，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区别于西式现代化的根基。没有这个基础，社会主义的大厦就无从建立。动摇或者损害了这个基础，就动摇或损害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而这恰恰是很多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道路时有意无意之间所“忽略”的。他们要么认为在西方经济学视野里，政治是不重要的；要么认为在西方政治学的研究视野中，更多地遵循政府与市场、民主与专制两分法，政党是不重要的。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应该弱化中国道路的制度属性。因为如果过度强调所谓的“中国特色”，过度强调中国道路的制度

① 参见《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74页。

② 参见卫兴华、桑百川：《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属性,就有可能损害其对其他国家的借鉴意义或者削弱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进而认为应该“用学术的话语讲政治,而非用政治的话语讲学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①

其次,作为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低、层次多、不平衡,从而决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不成熟性和非纯粹性。亦即邓小平所讲的“不成熟、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中多多少少还存在一定的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所有制结构上,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同时,还必须大力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引导和支持非公经济发展;第二,在分配制度上,在坚持按劳分配主体地位的同时,还必须将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实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第三,在资源配置方式上,必须坚持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结合起来;第四,在对外开放上,必须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实行渐进的、自主的、有限度的全球化,在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同时最大限度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这既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相对于发达社会主义国家的特殊性,同时也是其相对于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特殊性,真正意义上体现“中国特色”。在此过程中,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趋于形成。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2012年至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创新性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坚定不移地推进一系列改革和发展,使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全方位、根本性的变革,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境界,迎来了中华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成为我国发展的新的历史方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创新性发展。

首先,从我国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来看,我国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十九大宣布,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的新的历史方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充分不平衡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并没有改变,我国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并没有改变。^②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又提出,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这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进入新发展阶段明确了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我们目前所处的新发展阶段,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同时也是其中经过几十年积累、站到了新的起点上的一个阶段,未来30年都将是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历史宏愿的新发展阶段。^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社

^① 参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22页。

^② 参见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12页。

^③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页。

^④ 参见习近平:《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473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党的十八大之后由于社会主要矛盾转换迈入的一个新的历史方位;^①而新发展阶段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进入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的关键时刻,是我国发展所处的新的历史方位。“新发展阶段”的科学论断,延伸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明确了当前我国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为我们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现实依据。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再到新发展阶段,这三者是相互包含、层层递进和跃升的关系,^②其共同的目标和归宿都是,到2050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三者都是为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而迈入发达社会主义阶段这一质的飞跃而进行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贯穿其中的主线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现实国情(参见图2)。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也不是一个自发、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阶段,而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③这一高屋建瓴的论断,打破了长期以来很多学者呼吁应该尽快结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提法的错误观点。这一观点认为,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就作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初级的阶段”这一论断^④,如果我们现在依然承认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就会否认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的现实,以及十九大宣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方位,更在相当程度上助推了这一观点。这些观点都是由于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与艰巨性缺乏清醒认识而盲目乐观的结果。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深刻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⑤事实上,从基本解决温饱问题(1990年)到总体小康(2000年),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0年)到基本实现现代化(2035年),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050年),既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一个又一个里程碑式的重大跨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非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新发展阶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启第二个百年征程的新的历史起点,这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精神。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当代中国最大的客观实际是什么?就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们认识当下、规划未来、制定政策、推进事业的客观基点,不能脱离这个基点,否则就会犯错误,甚至犯颠覆性的错误。”^⑥中共百年卓越历史充分说明,我们党什么时候能真正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确认识我国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找准基点,就能制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发展战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展;否则超越发展阶段,急躁冒进,只能导致社会主义现代化

① 参见沈伯平:《准确把握新时代的“变”与“不变”》,《人民论坛》2018年第13期。

② 无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还是新发展阶段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从社会性质上来讲都隶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时代的起点是党的十八大,而新发展阶段的起点是“十四五”时期。从时间范围上讲,新时代是涵盖新发展阶段的,所以说这三者是相互包含的关系;从层次的角度,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再到新发展阶段,越来越接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目标。后者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复杂发展过程中的部分质变。因而这三者之间又是层层递进、不断跃升的关系。

③ 习近平:《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474—475页。

④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12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9—380页。

⑥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79页。

建设事业的挫折与失误，甚至会犯颠覆性的错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40多年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克服了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又抵制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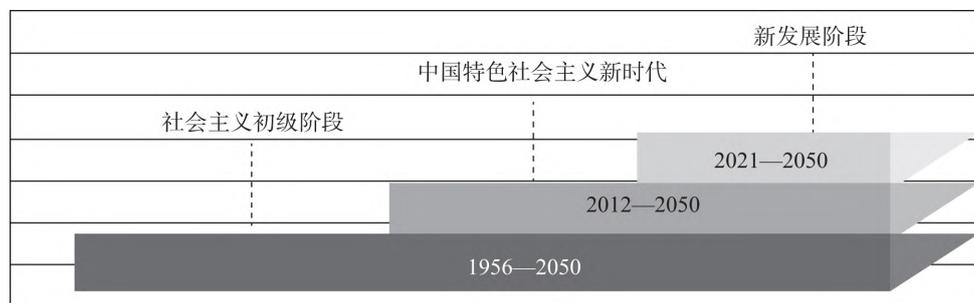


图2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与新发展阶段之间的逻辑关联

其次，从中国经济运行实践看，2014年以来，^①由于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以及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三期叠加”，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这意味着我国长期以来依靠资源、能源、劳动力、资本等要素驱动的高速增长已经难以为继，中国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和结构调整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2018年以来持续四年多的中美贸易争端，也在相当程度上凸显中国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随着资源能源供应的全面紧张、生态环境脆弱以及中国政府对于碳达峰碳中和“3060目标”的庄严承诺，^②再加上我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弱化，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必须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比较优势转向竞争优势，必须推动经济发展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再次，从国际国内来看，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中国成立70多年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筚路蓝缕、披荆斩棘，中国经济实力不断提升。世界经济版图发生的深刻变化前所未有，国际力量对比发生的革命性变化前所未有，我们接近世界舞台中心的距离前所未有。2020年中国政府率先取得抗击新冠疫情的重大战略性胜利并如期完成脱贫攻坚计划，进一步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凸显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相对于西方模式的巨大优势。而处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由于抗疫失败及其所导致的BLM运动^③、对少数族裔的系统性歧视、冲击国会山以及对他国内政的粗暴干涉等等，这些不仅成为美国硬实力走向衰败的分水岭，而且使其一直引以为傲的“软实力”也丧失殆尽。西风东渐、全球经济中心的转移已经不可避免。与此同时，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世纪疫情的叠加，使得全球范围内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浪潮风起云涌，动辄叫嚣与中国经济“脱钩”的呼声此起彼伏。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国际

^①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工作时第一次提及新常态：“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参见《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引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述评》，《人民日报》2014年12月8日。

^② 2020年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表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的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俗称“2060目标”或者双碳目标，目前这一目标已被纳入“十四五”规划。

^③ BLM是“Black's Life 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有些意译为“黑命贵”）的简称，是指美国境内爆发的针对非洲裔黑人种族歧视的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

环境中把握好未来发展的主动权，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行稳致远，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选择。

正是在这样的国际国内背景之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和新发展阶段这一新的历史方位，紧紧围绕“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时代课题，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创新性发展，开拓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新境界（参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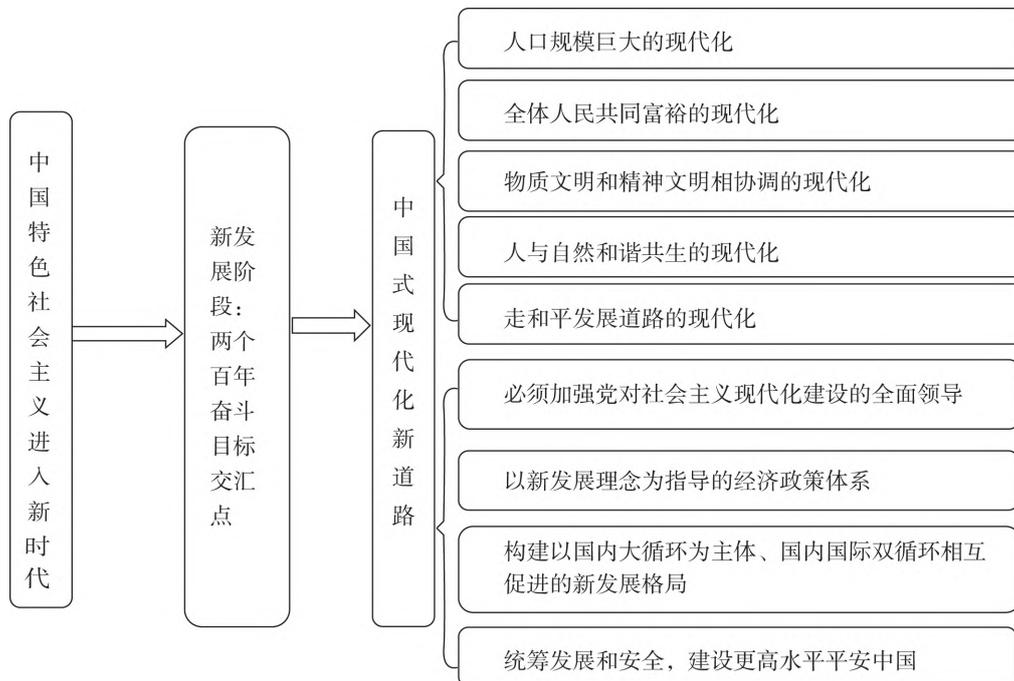


图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创新性发展

首先，对于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所要实现的现代化必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实际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必须坚持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这一论断主要包含三个层次：其一，中国式现代化是全民的现代化，是中国14亿人口巨大规模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其二，中国式现代化是全面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其三，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与西方发达国家建立在殖民扩张基础之上的、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竭泽而渔、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严重失调、以资本权力为中心贫富两极分化的现代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开创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中国是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而且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及其内部存在着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问题。这必然意味着：其一，在这样一个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实现现代化确属不易。在中国，任何一个大数字除以14亿都是一个小数字，而任何一个小数字乘以14亿都是一个大数字。因而各级领导干部在治国理政时必须“心怀国之大者”，治大国如烹小鲜。其二，在一个14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实现现代化，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第一

次,必然会引起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国际治理体系发生根本性变化,必然会对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人类社会发展史作出重大贡献。其三,也正源于此,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必然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与挑战。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①在新时代,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不断夯实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基础。^②2013年以来,我国在短短8年时间解决了近1亿人口的绝对贫困问题,在人类减贫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光辉篇章。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向相对贫困进军”。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我们决不能允许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决不能在富的人和穷的人之间出现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要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共同富裕不仅仅是一个口号,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真实可感的事实。”^③2021年6月10日,国务院决定将浙江作为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中国共产党正用自身的实际行动脚踏实地地践行对人民的郑重承诺,真正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要有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还必须有高度发达的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因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没有高度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④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应该仅仅是物的现代化,还应该包括人的现代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促进物的全面丰盛和人的全面发展。

第四,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面对新时代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面对我国严峻的资源环境压力和环境承载能力的有限性,中国的现代化不能重复西方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必须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新路。我们既不能在发展经济时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竭泽而渔,也不能在强调生态环境保护时舍弃经济发展而缘木求鱼。^⑤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努力寻求一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互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之路。

第五,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人民。近代以后,中国人民经历长达百年的列强侵略之害、饱经战火蹂躏之苦。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所有民族中经受外来侵略苦难程度最深、历时最长的民族,深深懂得战争的残酷、和平的宝贵。中国将坚定不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开放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之路,着力打造互利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着力打造地球生命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最终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页。

② 参见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求是》2021年第10期。

③ 习近平:《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480页。

④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44页。

⑤ 参见习近平:《坚定信心,勇毅前行,共创后疫情时代美好世界——在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的演讲》,《人民日报》2022年1月18日。

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永远不称霸、不扩张，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的发展是对世界的贡献和机遇，而非挑战和威胁。

其次，对于新时代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主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实事求是、稳中求进，进行了一系列前瞻性思考和全局性谋划，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实践基础之上的理论创新，为在一个14亿人口的东方大国顺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遵循和根本的行动指南。其内容概括起来就是：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与安全。

第一，必须加强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能不能驾驭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不能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从根本讲取决于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得好不好。”^①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以及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这一国际地位，决定了我们必须将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依然是解决当代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因为“党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经济工作是中心工作……抓住了中心工作这个牛鼻子，其他工作就可以更好开展”^②。未来30年，进入新时代新发展阶段的中国，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也是全党全国人民各项工作的中心。加强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领导，就是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政治优势、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制度优势同坚持新发展理念的理論优势统一起来，推动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在职能配置上更加科学合理、在体制机制上更加完备完善、在运行管理上更加高效。”^③加强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领导，也是打破既得利益藩篱、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还是确保党的各项路线、方针和政策能够得到不折不扣的贯彻和落实的必然要求。

第二，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经济政策框架。“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发展理念是否对头，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实践告诉我们，发展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进程，发展环境不会一成不变，发展条件不会一成不变，发展理念自然也不会一成不变。”^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思路，主要包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再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的思想；我国经济处于“三期叠加”时期以及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论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论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由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必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发展和安全等十三个方面。^⑤这些新发展理念形成了一个系统的、科学的理论体系，是我们立足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遵循和行动指南。其中，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新发展理念是最重要的、最核心的凝练表达。坚持创新发展，就是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就是要解决发展动能转换的问题，改变重大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推动中

^{①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325、318页。

^③ 习近平：《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487页。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197页。

^⑤ 参见习近平：《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475—478页。

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坚持协调发展，就是要解决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问题，着力增强发展的整体性和协调性；坚持绿色发展，就是要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坚持开放发展，就是要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进一步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坚持共享发展，就是要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不断增进人民福祉，真正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使社会各阶层人民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贯彻新发展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不能简单以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必须实现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①

第三，必须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传统国际大循环的作用明显弱化，必须切实改变过去那种“大进大出，两头在外”，以国际大循环为主体的旧发展格局，更多地将发展的立足点放在国内，更多依靠国内市场实现经济发展，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可谓披荆斩棘、历经坎坷：从1989年政治风波、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2018年中美贸易争端，再到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我国之所以能在几乎每十年一次的各种内外部重大冲击中闯过一个又一个急流险滩，原因就在于中国式现代化是建立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基础上的现代化。我们惟有立足自身，努力练就百毒不侵、金刚不坏之身，才能“任尔东西南北风，千磨万击还坚劲”，才能顺利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通过科技创新和突破产业瓶颈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既要凭借超大规模国内市场的优势打造强大的国内经济良性循环体系和稳固的基本盘，并借此形成对全球范围内各种生产要素的强大吸引力，从而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还要通过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的效率和水平，通过国内大循环的主导作用塑造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进而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良性互动的新发展格局。^②

第四，必须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从国内来看，其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尤其是由于新冠疫情的冲击，原先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所累积起来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有可能因为增长速度的下降而凸现。比如就业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经济结构不合理、企业竞争力不强等问题，如果处置不当，经济社会风险有可能转化为政治安全风险。其二，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长期渐进改革所遵循的先易后难、先增量后存量、先体制外后体制内的改革顺序，必然意味着全面深化改革会转向存量改革、体制内改革等“难啃的骨头”，改革所蕴藏的社会风险和矛盾阻力巨大。其三，我国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历史阶段，矛盾和风险要比经济没有发展起来时更多更复杂。从外部看，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然会带来百年未有之不确定性，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任务异常艰巨繁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③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未雨绸缪；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妥善应对各种外部环境变化可能带来的冲击和挑战。因而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实施国家安全战略，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

①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34页。

② 参见习近平：《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482—486页。

③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2页。

种风险，筑牢国家安全屏障。^①从十九届五中全会的具体内容来看，无论是作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部署，还是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这一前瞻性谋划，以及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步伐，力争实现2027年建军百年奋斗目标等战略性安排，无不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坚持以底线思维统筹发展与安全，牢牢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性布局 and 先手棋。

四、结 语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进程中对我国发展所处历史方位认识的演变视角构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话语体系，雄辩有力地证明了“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②。这一研究范式至少可以体现以下几个方面的创新。

第一，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结合起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际上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学术话语表达方式，不能人为割裂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客观联系。必须凸显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相对于西方现代化道路之制度性属性：共产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必须凸显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相对于建立在殖民扩张基础之上的西方旧式现代化道路的本质区别之处：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方向。其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其最鲜明、最靓丽的中国特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什么是中国特色？这就是中国特色。”^③

第二，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及新发展阶段结合起来。基于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的视角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话语体系，既能讲清楚我们（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从哪里来，又能讲清楚我们现在在哪里，还能讲清楚我们将往何处去。既体现历史的纵深感，又保持一定的前瞻性，使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形塑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时期中国道路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主要矛盾的变化和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这一新的历史方位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则决定了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创新性发展。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而后者则是对前者的继承和发展，是对前者的守正创新。

第三，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及新发展阶段这一组相互包含而又层层递进和跃升的概念构建中国道路的话语体系。它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这一唯物史观的精髓；同时也使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更能理解为什么我们现在必须实行这样的路线和政策而不能实行别样的路线和政策，我们为什么选择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而非走上其他某种道路；这一话语体系更体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非一个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也不是一个自发、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阶段，进而凸显了习

^①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36页。

^②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6页。

^③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8页。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理论品质。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在相当长时期内，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还必须同生产力更发达的资本主义长期合作和斗争，还必须认真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创造的有益文明成果，甚至必须面对被人们用西方发达国家的长处来比较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不足并加以指责的现实。我们必须有很强大的战略定力，坚决抵制抛弃社会主义的各种错误主张，自觉纠正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最重要的，还是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① 在当下的中国，办好自己的事，就是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进程。

第四，基于中国共产党人对本国发展所处历史方位不同判断的视角构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话语体系，还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独具特色、有别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它打破了只有遵循资本主义模式才能实现现代化的神话，克服了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固有的弊端，提供了现代化的全新选择，展现了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光明前景。中国式现代化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开辟了后发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崭新道路。新中国成立70多年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筚路蓝缕披荆斩棘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新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世界各国探索更好现代化道路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责任编辑 孔伟]

Constructing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Orientation

Shen Boping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23, China)

[Key words] historical orientation;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e discourse system construction

[Abstract] Looking back on the arduous journe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traveled in searching for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ical orientation to understand China's development,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in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determine the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of the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n the period of reform, opening up and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The evolution of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s in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environments faced by China since it entered a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require an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new path to modernization in the new era. From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to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n to the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there is a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ree that features the mutual inclusion, progression and leap, and the main thread running through them is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All of the above provides a reference with high consistency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real, multi-dimensional and comprehensive discourse system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① 参见《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9年, 第692页。